# 网售处方药开闸 管得严才能放得开

□ 罗志华

近日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《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简称《办法》），涵盖药品网络销售管理、平台管理、监督检查、法律责任等内容，自今年12月1日起施行。新规首次对于处方药网络销售作出详细规定。专家认为，《办法》的出台，对产业链上各方提出了更高要求，堵住了“先药后方”等漏洞，在提升药品可及性、支持新兴业态发展的同时，切实保障用药安全。

处方药网售渠道不通，难免成为民众求医问药的绊脚石。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，外出开药十分不便，隔离在家的居民尤其是慢性病患者，面临无药和断药之苦，十分希望尽早放开网售处方药。此外，互联网诊疗发展迅猛，有望成为民众看病的重要渠道，但处方药不能网售，使之面临有医无药的尴尬处境。网售处方药开闸，顺应了医改的趋势，是关爱民生的切实举措。

过去在一些实体药店，不需处方就能买到处方药是常见现象。处方药线下滥用若被照搬到网上，危害将数倍增加。此外，近年来少数电商售药平台违规销售处方药，有时连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也暗自销售，假如这些暗道不堵死，就可能变成网售处方药安全堤坝上的“管涌”。互联网具有跨区域和隐匿性强等特点，尤其需要前置性地防范风险，把紧监管的闸门。

网售处方药的安全风险点很多，重中之重是要确保销售企业符合资质要求，确保处方来源真实、可靠，以及明确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向个人赠送处方药等。《办法》要求，网售处方药实行实名制；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与电子处方提供单位签订协议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方审核调配；第三方平台承接电子处方的，应当对电子处方提供单位的情况进行核实……这些规定，均是将安全放在首位的有力举措。

用药安全归根结底，是要着重摆正医和药的关系。对于普遍商品，电商下单即买，以消费意愿为主，把顾客当“上帝”。然而，处方药线上销售不能简单依顺和满足消费需求，而且要根据病情所需，由医生作出决定。药为医服务，药不能喧宾夺主，没有医就不能有处方药，是医疗行为的基本逻辑。倘若医药颠倒，不经诊疗就开处方药，甚至任由消费者随意购买处方药，就容易导致处方药被滥用。

摆正医和药的关系，起决定作用的是处方。先有医，再有处方，才能确保处方对症；先有处方，再有药品，处方药才会用到合适的地方，使药品的治疗作用最大化、毒副作用最小化。处方是医和药最重要的连接纽带，只有谨守医、方、药三者的次序，确保三者既不颠倒，也都真实可信，网售处方药才能得到严管与善用。

网售处方药是否安全，取决于规则是否明晰、监督是否到位、民众是否鼎力配合等。管得严才能放得开，安全基础牢固的便利，才是真正的便利，也才能行之久远。

# “路边摊”解禁 从地摊经济中感受创新活力

□ 朱昌俊

日前，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了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。其中，关于不再对设摊经营、占道经营等全面禁止的规定，引发外界广泛关注。

根据相关负责人的说法，对设摊经营、占道经营，以前在上海是全面禁止的，新规则在规定不得擅自占用道路、桥梁等公共场所设摊兜售的同时，明确区和乡镇政府可以划定一定的公共区域用于从事设摊经营、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等经营活动，较好地平衡了市容管理需要与民生需求。

要知道，“路边摊”在城镇化的过程中，曾不断被贴上妨碍市容、影响道路交通等标签，几乎被视为“脏乱差”的代名词。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，看不到路边摊，似乎被当成了城市文明指数的一种象征，而关于城管与路边摊经营者的执法纠纷，也时常成为备受争议的话题。在这个背景下，作为一线城市的上海宣布对路边摊不再“一刀切”禁止，让人感受到城市治理观念的新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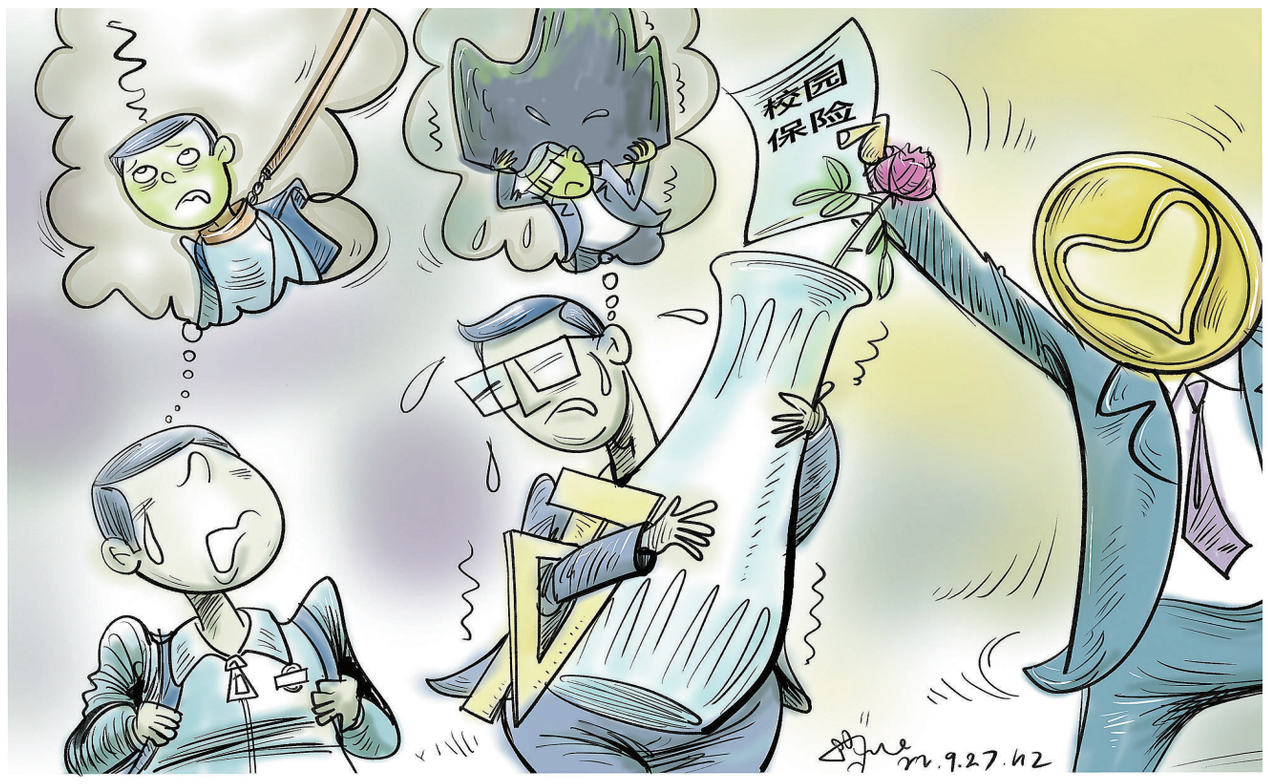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路边摊作为一种边缘性的城市经济活动，它之于民生和市民生活的便利，都有着直接的好处。同时，在当前的经济大环境下，对它的包容，更是刺激消费，留住城市烟火气的务实之举。因为设摊经营相对来说门槛较低，且成本较低，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。所以，早在2020年疫情发生后不久，成都等城市就发文允许商家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、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经营。

不过，越来越多的城市对设摊经营包容的背后，实际也是因为如今的“地摊经济”，确实较之过去有了很大变化，我们不能再完全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它。事实上，上海、成都等地对于地摊经济的放行，都离不开发展夜间经济、体验经济等大背景。也就是说，如今的地摊经济，已经成为新的城市经济形态，它理应在城市空间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
比如，在不少城市，都可以看到年轻人利用汽车后备厢摆摊的现象，甚至在社交媒体上，“后备厢经济”已成为网络热词。而他们所售卖的商品，也不止于传统的水果、鞋袜、烧烤等，不少还是文创商品。在地点选择上，这些打着LED补光灯、外放流行歌曲、贴上新潮销售推广语的后备厢摊点，也不再是设置在一般的居民生活区，而是公园、广场等市民休闲活动的聚集区，甚至一些由地摊、后备厢摊点构成的“夜市”，还搬到了年轻人聚集的CBD（中央商务区）。它们成为点燃城市夜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，没有人会觉得它与城市不搭调。相反，它们还给城市生活增添了新的乐趣。

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，“后备厢经济”虽然与普通地摊看起来很像，但又有所不同——每一辆车的后备厢更像是一个浓缩版的商店，其中不仅体现出经济属性，更彰显着摊主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生活品位，还融合了社交、文化属性，与汽车文化、美食、夜生活、露营经济等新业态紧密相连。同时，它也给年轻人创业提供了新的机会。比如，一些年轻人设计文创产品、新式奶茶、个性咖啡等，最初还不具备开店的能力，便能以摆摊的方式来进行试验、推广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如今的城市地摊，也可以说是创业、创意的孵化地。

可见，“地摊经济”可以很时尚、新潮，并且有越来越多的都市青年参与其中。对之予以因地制宜地包容、规范，为它们提供必要的生存空间，也是平衡市容与民生、经济、创新的务实之道。




两头兼顾

磕掉牙，摔骨折，被踩伤……学生在校园里因为参加体育运动、打闹等原因有时会发生意外伤害。专家建议，主管部门和学校可以引进第三方体育运动意外伤害保险机制，在保障学生适当活动权利的同时履行安全保障义务。（《北京晚报》9月26日）

漫画 徐 简

# 在“三秒变读书博主”的喧嚣中坚守读书的意义

□ 黄西蒙

最近，网络短视频平台出现了一批“假装读书”的博主，他们以“分享阅读”的方式“教人读书方法”。从《北京日报》等媒体的报道来看，这些博主中不乏“标题党”，类似“20岁女生必读的7本书”“让你脱胎换骨的5本书”等书单很抓人眼球，“免费看书月入过万”“三秒变读书博主”的口号也很有诱惑力，但其中的内容往往“营销味”满满，不能让人真正获益。

碎片化的阅读，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常见阅读方式。“你有多久没完整读完一本书了？”这一问题令不少人难以回答，进入职场后，很多人放弃了学生时代的阅读习惯，即便能抽空看点东西，往往也只能被一些博主“投喂”。

如今网上有很多“解读书籍”类的视频和文章，就是有人替你把书的内容拆解并分析，得出一些看似深刻的心得。但是，普通读者只能单向接收这类信息，如果没有真正去深入阅读一本书，自然也谈不上有多大的收获。一些人用“打卡”的心态去读书，似乎只要翻上几页，看过一本书的只言片语，就算“读过书”了。显然，这种不成系统、不够专注的阅读，无法真正体现读书的价值。

网络时代，很多人都在“假装读书”，但阅读与思考的过程，难免需要一些“孤独感”，起码也要有一颗平静的心。远离浮躁的状态，才能沉浸在知识与思想的海洋中，感受阅读带来的震撼与趣味。因此，从个人成长的角度看，年轻人不妨有意识地与“三秒变读书博主”之类的东西保持一定距离，给纯粹的阅读留出一点精神空间。

或许是在夜深人静的睡前时分，或许是在漫长的通勤地铁和公交车上，只要是“私人时光”，都可以用来读书。如今的阅读载体不断变化与革新，各种方便实用的读书类App，可以将成百上千本电子书存储在手机里，让人随时随地阅读。

技术的进步，虽然造成了一些浮躁的风气，但也给真心热爱阅读的人提供了帮助。我们不仅获取书籍更加便利，还可以通过一些读书社群，了解新书资讯，发现同道之人。活跃于网络上的读书爱好者，也时常会列出书单，帮助对某一领域感兴趣的读者了解学科的整体脉络，根据书单去找书、读书，进而建立更加全面的知识体系。即便是稀见的书籍，也有可能在网上找到“共读者”。爱好读书的人，不分年龄、性别、地域、学历，只要对某个领域感兴趣，并且愿意认真阅读，就可能成为互相交流、砥砺思想的朋友。

“三秒变读书博主”之类的现象令人摇头，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对阅读保持一颗虔诚的心，就能在碎片化的信息环境里找到读书的乐趣，与志同道合的人一同进步。

# 落实中小学教师“职称新政”需要注意什么

□ 熊丙奇

长期以来，职称评聘备受中小学教师关注。职称的高低，不仅跟教师的个人收入相关，也是对教师自身专业能力的认定。由于之前的政策对不同教师职级岗位结构比例进行了规定，使得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竞争非常激烈。近日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教育部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小学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有望使困扰中小学教师多年的“评职称难”得到改善。（《中国青年报》9月26日）

《意见》的最大亮点，就是不再在国家层面对高、中、初级岗位结构比例作统一规定，而是在明确合理配置要求的基础上，授权省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分学段、分类型科学设置教师岗位结构，适当优化调整中小学岗位结构比例。这一举措有利于各地根据本地教育发展情况、教师队伍建设情况，设置合理的中小学岗位结构比例，给教师更大的职业与事业发展空间。

在国家层面统一对中小学高、中、初级岗位结构比例作出规定，已经不适应当前的教育发展形势。各地教育发展水平不同，教师队伍建设也存在差异，统一的教师岗位比例，会影响各地优化教师队伍建设。比如，报道中提到江西省兴国县思源实验中学在编教师143人，中级职称人数64人，高级职称教师6人，由于高级职称人数已满，中级职称无法晋升高级，初级职称也无法晋升中级，而学校有70多名教师要评中级。由于岗位比例限制，如果旧制不改，新进教师很可能10年、20年都无法评上中级。

近年来，我国一些省份已经对中小学岗位比例作出调整。如浙江省连续两次提高高级岗位比例，目前全省中小学正高级岗位比例2%，副高级岗位比例在小学为15%、在初中为35%、在高中为42%，并允许各地打通使用中级岗位和初级岗位比例。提高高级与中级职称比例，让更多符合条件的教师获得晋升机会，是调整中小学岗位比例的基本趋势。

不过，单独提高中高级职称岗位比例，不足以解决所有困扰中小学教师的问题，唯有做好配套措施，才能让教师队伍切实受惠。首先，与职称对应的是收入待遇，提高中小学中高级职称岗位比例，意味着各地要增加教育投入。对于财政实力相对薄弱的地区来说，提高中高级职称教师岗位比例，可能会带来财政压力。这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地方的教师待遇差距，造成欠发达地区教师向发达地区流失。解决这一问题，需要强化省级财政统筹，并加大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，推进各地区的基础教育相对均衡发展。

其次，提高中高级职称岗位比例后，职称评审依然可能存在“僧多粥少”的问题。这次《意见》提出，要坚持激励和约束并重，发挥学校在用人上的主体作用，健全完善考核制度，加强聘后管理，奖优罚劣，树立重师德、重能力、重业绩、重贡献的导向，构建人员能上能下、能进能出的灵活用人机制。当下，一个教师只要评上高级职称，哪怕岗位职务发生变化，就会一直享有相应的待遇。如何做到“能上能下、能进能出”，也对加强职称制度的合理性有重要意义。

要解决这些问题，需要进一步改革职称评审制度，建立基于职务的教师管理与评价体系。具体而言，应该逐渐淡化职称对教师收入待遇的影响，根据教师的职务与教龄，确定教师的年薪，年薪随教龄增长而增长。去年年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提高教龄津贴标准，就体现了重视教龄的改革方向。建立基于职务与教龄的教师薪酬制度，既可以解决职称与职务“两张皮”的问题，也可以激发教师的职业荣誉感，引导教师重视提升岗位能力，爱岗敬业，在自己的职务岗位上作出贡献。

# 150亩基地只是劳动教育的一种打开方式

□ 李华锡

今年4月，教育部印发《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（2022年版）》，今秋开学起，劳动课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。近日，云南省宣威市西宁街道靖外明德小学连续15年“自给自足式”的劳动教育受到关注。在接受课堂教学之余，学生还参与采收玉米、土豆、辣椒以及野炊等活动，并体验花鹿、鸵鸟、鸸鹋、豪猪、珍珠鸡等动物的养殖。立足学校建设的150亩劳动教育基地，该校自给自足，上千名师生已实现三餐免费。

羡慕归羡慕，这种劳动课程离不开学校的特殊条件。据报道，靖外明德小学在2008年建校，是由当地5所农村小学撤并后成立。依托12亩校园绿化带和150亩的劳动教育基地，各年级各班每周2节劳动课。但对多数学校而言，即便是位于农村地区，也未必拥有如此大面积的土地供开展劳动教育。处于城市的中小学更是没有条件，如果执意要将劳动课搬到田间，不仅劳神费力、大费周折，效果也只能停留在浅尝辄止的程度。

一想到劳动课，很多人的脑海里就是到田野里观察农作物、采摘水果蔬菜，体验庄稼收割。其实，劳动课并不注重形式，也不一定非得“走出校园，走向农村，走进田地”。课程设置需要因地制宜，考虑到学生的年级和认知程度，结合地方特点和学校特点开展。近日，教育部在对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指出，劳动教育主要以实践为主，全国各地情况差异较大，全国不统一使用一种教材。

涉及劳动教育课程的内容，应当符合学生年龄和身心发展特点。比如，近年来，我国加速推进垃圾分类制度，垃圾分类被纳入劳动教育课程体系。以此为契机，可以培养一二年级的学生依据颜色或文字提示辨别不同类型垃圾桶，知道垃圾分类投放的要求；三四年级学生以理解日常生活清洁与卫生为基本内容，理解分类投放垃圾的方法和原理；五六年级学生初步接触对可回收垃圾的回收再利用等。

可以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入手，在劳动教育过程中融入多学科知识。比如，可以教学生如何使用燃气，如何购买蔬菜，并学会自己做一道菜；再比如，教学生们制作手工竹蜻蜓、纸飞机等，在制作过程中巩固数学和物理知识，寓教于乐。

也可以结合学校的特色开展劳动教育。如果学校周边为住宅区或闹市区，可以带领学生在周边街道捡垃圾，清洁墙体广告，让学生为城市卫生作贡献；如果是寄宿制学校，可以教学生认真打扫寝室卫生，学会叠被褥，铺床单，在锻炼动手能力的同时体会父母的辛苦；如果学校绿化面积较大，种植的花草树木种类较多，可以带领学生认识植物名称，清除杂草，为花草树木施肥浇水，让学生学会爱护植物，保护大自然。

总之，劳动教育应避免“一刀切”，更不要千人一面，互相模仿，而是要因地制宜，充分利用学校条件开展教育。反之，如果为了刻意追求形式而折腾学生，劳动课的意义难免打折扣。

# 优化招生制度 破解“录而不读”

□ 杨鑫宇

目前，各大高校秋季学期开学已有一段时间，然而，仍有一些本该出现的学生迟迟未能现身，只得被认定为“弃读”。近日，中国政法大学在官方网站上公示了32名因故无法按期入学的2022级研究生新生，引发热议。不乏有人认为，这些“录而不读”的学生浪费了研究生招生名额，对其他考生不公平。据中国政法大学工作人员介绍，相关专业已经无法补录，但是学校会尊重这些考生的选择。

近年来，本科生、研究生“录而不读”现象日益受到关注。2021年，安徽师范大学有105名全日制本科新生放弃入学资格，福州大学有119名本科学生放弃入学资格，华南农业大学有177名本科新生放弃入学资格。除此之外，中国地质大学、太原理工大学、苏州大学等高校的名字也出现在相关新闻之中。其中，不乏有口皆碑、众人向往的名校。

站在高校的立场上，学生不来就读有一种被“放鸽子”的不良感受。为此，早年一度有高校提出：要对放弃录取资格的学生设立“黑名单”。不过，经过多年讨论，舆论普遍认同：高校录取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，不宜给不来就读的学生轻易扣上“失信”帽子。考生在规则许可的范围之内，追求个人最优选择，有其自身合理性，现行录取制度也缺乏惩罚“弃读生”的依据。

然而，在高校与“弃读生”的矛盾之外，还有另一重不容忽视的矛盾。这矛盾存在于放弃录取者与未获录取者之间。对“弃读生”怨气最重的并不是高校，而是那些因为微小的分数、名次差距，与理想院校失之交臂的人。站在这一群体的视角上看，那些放弃入学的人，浪费的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机会。

这么说，不是要对“录而不读”的考生搞“道德绑架”。而是希望高校和有关部门对现行录取制度加以改进，预防矛盾发生。录取制度还需充分考虑考生“弃读”的潜在可能性，设计相应对策。通过更加合理、灵活的制度设计，高校和考生之间可以避免沟通不畅造成的资源浪费，实现更加高效的双向选择，把避免教育学术资源浪费作为高校录取工作的制度目标。

要实现这一目标，有不少案例与经验可资参考。部分海外高校在录取考生时，会依照排名次序，给未获录取的学生设立较长的轮候名单，一旦有获得录取的考生放弃资格，轮候名单中的考生就能依序递补。当然，要让这一制度顺利运转，离不开高校与考生的事先沟通，只有在被录取者提前通知高校，声明放弃录取资格的情况下，轮候者才有可能在开学前得到补录。如何在高校与考生之间建立信任，并且留出足够的缓冲期，让学生预先作出选择，应当成为录取制度设计的重要一环。

近年来，国内有学者提出：应当在录取过程中为高校和考生提供更直接的沟通渠道，建立“双向确认”机制，从而最大限度保证被录取者的就读意愿。缺乏沟通渠道，正是近年来考生“弃读”现象频发的关键原因。很多时候，“录而不读”的考生都不是存心要欺骗高校，只能通过不来报到的方式被动表达个人意愿。对此，如果能改进录取期间高校与考生的沟通模式，无疑是多方共赢的好事。归根结底，优化招生流程，才是最值得社会关注的问题。

# 英语教学：不仅要教，更要教好

□ 楼优奇

近日，教育部网站公布了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出“关于增强文化自信、增加中国文化内容教学改革和降低英语教学比重的建议”的答复，肯定了外语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。作为一名高中英语教师，我对当下的中学英语教学也有不少切身感触。笔者认为，英语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中国情怀、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，英语学科教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。相比于调整课程比重，如何在为党、国家和社会育人这个大方向的指导下，把英语教学做得更好，才是更加值得社会关注的问题。

2020年秋季学期以来，我所在的省全面推行实施新课改、使用新教材的“双新”举措，给高中英语教学带来了机遇，也带来了挑战。一方面，新课程标准凝练了学科素养，更新了教学内容，研制了学业标准，增强了指导性。但另一方面，“双新”理念要落地，也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观、理论理解运用能力、教育教学能力和学科知识储备等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教师们除了课堂教学，还要完成阅卷、改作业、命题等工作，要帮助学生在高考、学考和各种形式的考试中取得理想成绩，现实压力不容小觑。这样一来，不少教师在参加新课程、新教材培训时“心潮澎湃”，回到常态课堂中“涛声依旧”，就不足为奇了。

当下，中学英语教学有着良好的框架，但在课堂实践中，仍有不少问题需要得到解决，如阅读教学重视词汇知识、轻视思维培养；教学评价以考试等终结性评价为主，不关注学生学习过程；课外阅读开展过程中过于注重好词好句积累，轻自主阅读能力培养等。要解决这些问题，教师、学校、教育主管部门还需转变思路，共同发力，如此才能让英语教学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发挥出更大的积极效果。

笔者认为，高中英语教学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必须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。

首先，教育者应当将内容、思维、语言融合起来，做到“为内容而读，为思维而教，为语言而学”，充分挖掘其德育价值，落实于实际教学中。如高中英语必修二第一单元Cultural heritage（文化遗产）的教学目标之一，就是要学生了解中外文化遗产的历史与现状、所面临的问题，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。再如2022年某道英语应用文高考真题，要求学生给一位爱尔兰朋友写信，谈谈“中国-爱尔兰文化节”的活动体会和感受，这样的命题思路，也有利于激发学生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，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意识。

其次，新课标中强调的教、学、评一体化的大概念，要以过程性评价为主、终结性评价为辅。学生的学习成果，不仅要体现在考试分数中，更要体现在教师对学生的学习作品、学习表现等及时反馈上。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，要尊重学情，设定合理的学习目标，设计有效的学习任务，引领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培养核心素养，并在最后以不同形式对学生表现进行评价。

最后，通过培养自主阅读能力来提升结构化的思维品质，也是英语教育提升进步的一大方向。要真正让自主提问、自主解惑的阅读课堂教学活动设计成为教师努力的方向。要基于意义，融入语言，优化思维发展；以出为入，量入为出，优化教学设计；保障时间，把握时机，优化任务回应。在教师界，有句话说“教是为了不教”，对课外阅读提供课内支撑，如在课内对课外阅读策略进行指导和训练、以小组形式展示课外阅读成果、对课外阅读策略进行自主反思等，也能促进学生在课外自主阅读，使其获得自主进步的“源动力”。

（作者系高中英语教师）